

社会主义

◆ 肖枫 著

转折与创新

SHEHUIZHUYI
ZHUANZHE YU CHUANGXIN

当代世界出版社

书名题字：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王家瑞

社会主义： 转折与创新

肖枫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肖枫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10

ISBN 7-80115-692-7/D·175

I. 社... II. 肖... III. 社会主义—研究
IV. D0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4741 号

书 名：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

Shehuizhuyi: Zhuanzhe Yu Chuangxin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20.5

字 数：50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 7-80115-692-7/D·175

定 价：38.00 元 (平装)

48.00 元 (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言

我与肖枫同志在 1989 年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而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相识，至今已有十多年了。后来经常在一起参加学术活动，又同在一个学会，接触了解的机会就多了。通过学术活动，我发现肖枫同志既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又很注意戒“左”戒右，既力求观点要有新意和突破，又力求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六年前，他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时，邀请我作该书的顾问之一，彼此间联系切磋就更多了。最近，欣闻他的新作《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即将出版，我对他的勤奋多产甚为高兴，然而他恳请我为其作序，却让我颇感为难了。因为一是很多问题我缺乏研究，还没大搞清楚，二是肖枫同志在社会主义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学术上已很有名气和影响，由我作序自己觉得不妥。但他态度很诚恳，从朋友的角度看又不好回拒，只好写下几段文字，就权当是我为其写的序好了。

自 1848 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的 150 多年间，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由在欧洲游荡

的一个“幽灵”，到20世纪中叶发展成波涛汹涌的洪流，后来又遭受严重挫折，其中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恩格斯在1874年就曾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①可以说，社会主义是一门大学问，需要人们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尤其是在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面临转折与创新的情况下，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更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和下苦功夫去研究。

肖枫同志的新力作《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抓住了“转折与创新”这个带全局性的大问题，放眼世界、追溯历史、反思经验、进行理论探索，是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该书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有不少是学术界的前沿问题和难点问题，有些观点很有时代气息。这既是学术界所需要的，也是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所关心的。我认为，本书的出版是值得祝贺的。

该书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过去强调“国际联合”，转向各党“独立自主”；由过去强调必须遵循“共同规律”，从而形成单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转向强调从本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由过去强调国际援助、“支援世界革命”，转向立足国内各自把本国的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6页。

情办好，以此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加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中的吸引力。由过去实行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过去封闭半封闭转向对全世界的开放；由过去强调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转向同时还要重视不能回避和跳越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等等。对这些问题，作者依据实践经验和历史事实，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做了阐述，说明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转折，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像今天这样搞，而且只能这么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本书能起到解疑释惑，回答人们思想上的一些疑点和难点的作用。

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真正大发展是在 20 世纪。在这个世纪里，社会主义作为多少个世纪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在一些国家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后来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发展到多国实践，在坎坷和曲折中不断前进，开创了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变革历程。20 世纪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它开辟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并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但是，20 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波澜壮阔、大起大落，又经历了两次从高潮到低潮的曲折变化。这就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起点而形成的 1917~1923 年的革命高潮，到 20

世纪中期欧洲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中国革命胜利为主要标志，发展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到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又遭致前所未有的大挫折。与苏东剧变相对照，中国巍然屹立，顶住了这股逆流，在已经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贡献，出现了社会主义大发展的新局面。从总体上看，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基本态势是资（本主义）强社（会主义）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但是社会主义在总体低潮中已出现了局部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世界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看好中国。

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更加复杂多变。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更加有恃无恐的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它咄咄逼人，搅得世界很不太平很不安宁。但是，世界不可能由一个国家说了算。总体看，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社会主义既面临严重挑战，又有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的形势和任务变化了，战略思路也需要转折创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我们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去深入地进行研究，而这是需要学术界同仁长期共同努力的。

肖枫同志别的方面就不提了，在社会主义研究方

序言

面已先后出版了两本很有分量的专著。一本是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主持编写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另一本是为配合研究“四个如何认识”个人撰写的专著《两个主义一百年》。这两本书不仅在国内获得读者好评，广为流传，而且已译成外文，在国外产生影响。他新近完成的这本《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又与时俱进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虽然不能说这本书写得天衣无缝、尽善尽美，但许多观点和提法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在读者中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赵 曜

2003年7月29日于中央党校

代序

肖枫同志：

我很有兴趣地读了你这部著作的目录和前言，尤其是前言的第一节《从李一氓同志的一个重要观点谈起》。李老提出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要重新研究。“国际共运”的提法只是历史的沿袭，现在怎么提，也要重新研究。这是很有理论勇气，也是很有理论创见的。

这使我回想起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内理论思想活跃的生动景象。李老那时是在党中央一个部门主持工作的负责同志，可以说是一位“高官”吧。他研究这两个问题（不只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官方研究”吧。他的理论思考所形成的观点，如果得到中央领导的、全党的同意，可以说就成了“官方观点”吧。可见，“官方研究”、“官方观点”可以也应该是学术上很有价值、理论上很有创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许多重要的开拓和创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有拒绝独立思考，拒绝理论创新，一味重复已有的结论，翻来覆去净讲套话，才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不论它出自官方，还是出自

非官方。“官方研究”、“官方观点”，断然不应该是这样。如果变成这样，那就可悲了。

“官方研究”既然应该是创造性的，就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争论，创新也就没有了。你对李老关于“国际共运”的提法，既表示赞同又提出自己有所不同的意见，李老给你的回信，既坚持自己的意见又尊重你的意见。这个事例说明，在“官方研究”中也是可以和应该有良好的学术空气的。只有保持这种良好的学风，“官方研究”才能保持生气。

对于我们党已经做出的重大决策，有一个理论阐释和宣传的问题。“官方”的研究者（即在党和政府的机构中工作的研究者）有这个责任，“非官方”的研究者也有这个责任。如果党的这些决策有重大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意义，那么，对这些决策的阐释和宣传，对它们形成背景的历史分析，对它们丰富内涵的逻辑展开，对它们现实意义的评论和估价，对围绕它们的各种疑义的解剖和辩驳，这些都可以和应该是有创新意义的。当然，有许多阐释和宣传只是通俗性的，可以有也可以不要求有创新性，但是，研究性的阐释和宣传，则可以也应该要求它有创新性。

对于党的决策的宣传和阐释，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写入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的，可以认为是“官方观点”和“官方”阐释，而研究者们（包括在党和政府的机构中工作的研究者）对这些“官方观点”

的阐释，如果没有写进党和政府的文件，就并不要求也不应该被视为“官方阐释”。它是而且只是研究者的个人观点。对“官方观点”作个人阐释，在角度、深度、广度、丰度上可以也应该允许有所不同。对这种个人阐释，可以也应该允许提出批评。这是对党的决策的研究能够保持生动活泼、保持创造精神的必要条件。

再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实践的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是应该进行的。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谈什么决策的调整和创新呢？只是这种研究，有些可以在公开的出版物上进行，有些则先不宜公开，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探讨、酝酿，到适当的时候，才能公开。这是“官方”宣传所应该遵守的纪律。而到党中央做出新的决策，又需要进行新的宣传和阐释了。

你曾在中联部研究室工作，你对我们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决策的转折与创新的研究，会不会被视为“官方研究”呢？我想，应该说，又是又不是。说是，是因为你在“官方”的环境里做研究，对“官方”观点、对它们的形成和演变比较熟悉、比较了解，你也尊重党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把它们当作你的研究

的指南。为什么又说不是呢？因为你的论述，只是你对党的这些结论的由来、根据、内涵、意义的个人理解和个人阐释，党的文件里并没有也不可能这样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有许多也没有涉及；你的论述，比写入党和政府文件中的有更丰富的内容，有许多属于自己的见解；你的论述，也有属于批判性的反思和讨论性的探索的内容，还不是党的决策和定论。总之，你的论述，别人可以提出批评，提出疑问，提出补充，提出纠正。

我是这样看待你的这部著作的。我想，你也希望别人这样看待你的这部著作吧。

以上，是我读你的著作的目录和前言所产生的一些感想。这个前言，应该说是你的全书的总纲或提要，但我没有可能读你的全书，所以没有条件为你的著作作序。如果你仍需要我作序，并同意我这封信里的感想式的意见，就把这封信作为代序。一切由你定夺。

祝贺你的新著出版。此致
敬礼！

龚育之

7月14日

序 论

只有纠“左”防右， 国际共运才能转折创新

肖枫同志长期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事国际问题的调研工作。他能及时了解中央精神，又有机会接触大量第一手资料，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限于为中央的决策单纯地进行诠释和注解，而是敏于思考，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又勤于笔耕，所以多年来已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很有新意、很受欢迎。最近他的一本很有特色的专著《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又要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问世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作为他的老朋友和同行的理论工作者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与肖枫同志也算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友了。我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时起就一直在这里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课程，而他1957年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1961年毕业离校。虽然在校时不在同一个系，但他进中联部工作后却与我是同行，都是搞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他同我交往时总是尊称我为“高老师”，甚至在2000年10月一同参加中央党校举办的关于“四个如何认识”的高级研讨班上，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胡锦涛同志和众多学者

的面一再称呼“高老师”，我都感到有点不安了。后来劝他别这么叫了，可他坚持说，论年龄我大他十岁，论知识他望尘莫及，论学问也不如我，无论那一方面我都是他当之无愧、名副其实的老师。我们俩在大的方面是相当一致的，许多观点不约而同。我们都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特别是对“左”的危害感受很深，主张要纠“左”防右。但我们的观点也不总是完全相同的，然而我们彼此相互尊重，切磋求真。六年前，他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聘我为顾问之一，并邀请我与他合作撰写“总论：回顾和前瞻”，我写前面两部分，他写后面三部分。这个总论已于2000年3月由泰国曼谷的健心出版社译成了泰文本，取名《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我8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专著恰好同名）。他说，这虽是件小事，但表明我们“师生合作”的成果已在国外产生了影响。他的这部新作出版在即，专程登门诚恳地请我为其作序。尽管我双眼患老年黄斑变性，天气又这么酷热，前来求序者甚众，但他的盛情实在难却，最终我还是欣然同意了。

一、对共运三个“七十年”、两次大转折 创新的概括很有新意

通读肖枫同志40余万字的书稿，首先感到新颖之处是作者对全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作出三个

“七十年”的新概括，并且以此来界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两次大转折和创新，这是全书的立题之基、划题之界。作者早在1987年的一篇文稿中就提出：回顾共运的历史，从《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的140年之中，已完成了两个飞跃：以十月革命为界，前七十年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运动并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后七十年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主义阵地；今后世界资本主义还有相当的发展余地，因此要像第二个七十年内那样出现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共运的历史任务和发展战略要由“外延扩大”转向“内涵深化”，即社会主义要从量的增长（增加更多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质的提高（提供社会主义成功的榜样）。只有到21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这大体还需要七十年，这是国际共运第三个七十年内的任务，这表明国际共运处于新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在1987年作者就能依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做出这样宏观长远的分析和估计，提出世界共运将发生历史性大转折，即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高，应该说这是相当清醒的新见解。

中国人对“七十年”这个历史界限似乎特别有自己的体会和见地。孔夫子在《论语》中总结自己一生成长经验时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杜甫在《曲江二首》中留下名句：“人生七十古来稀”。这里所

讲的“七十”都是个人生命历程的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高限。推而广之，我们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时“七十年”恰好也是一个转折的限度。因为“七十年”大体上是个人一生创造力的时限，又是两代人交接班的时限。在这个时限内，由于世事与人事的变化与更替，社会历史不免发生重大转折。列宁早就指出过：“世界历史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①然而人生难有第二个“七十年”，而社会历史的发展却可能有第二个、第三个以至更多个“七十年”的轮回转折。如果七十年大转折体现了共运发展的周期律，那蔚为历史辩证法的奇观。

据我所知，我国理论界更早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七十年”的有童大林同志（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他于1984年11月间撰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科学社会主义新的历史命运》一文，着重阐发了同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年代的更替划分，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提出：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七十年构想对全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命运，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第三个七十年到来了”。第一个七十年，从《共产党宣言》奠定了无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66页。

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开始，造成了全球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第二个七十年，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使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地球上一系列国家中确立起来了。第三个七十年，是从中国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探索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将由历史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无比。^① 后来童大林同志把包括此文在内的三十篇文稿汇编成书，书名就称《第三个七十年》，于1986年2月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作为经济学家，童大林同志主要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展望第三个七十年的。他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七十年的开始。”他说的“三个七十年”带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七十年的意味，后来理论界又有“三次飞跃论”的说法。

无独有偶，肖枫同志于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年之际也独自提出世界共运的发展有三个“七十年”。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第三个“七十年”，这是很新的见解。在本书中，作者对第三个“七十年”与前两个“七十年”的区别作了更充实、更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第三个“七十年”的转折和创新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和平与发展”成

① 童大林：《第三个七十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版，第5~6页。